

汉字与日本文化之渊源略考

□李 旭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要] 汉字传入日本千余年, 历经数度改革与变迁, 与日本历史、文化水乳交融, 浑然一体, 甚至成了日本文化的象征性符号。通过对汉字传入日本的史实与传说, 汉字传入日本后在日本的受容与变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和分析, 多角度地重新审视了汉字的魅力以及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 汉字; 日本文化; 受容; 变容; 交融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0)06-0065-05

引言

2009年春, 日本文化厅公布了旨在“适应信息化时代需要”的“新常用汉字表”试行方案, 该方案新增“常用汉字”191个, 减去不常用汉字5个, 至此, 常用汉字增至2131个。该方案将在广泛征求国民意见的基础上于2010年正式实施^[1]。事实上, 汉字自传入日本一千多年来, 几经改革与变迁, 与日本文化形成了水乳交融、无法割舍的关系。而与此同时, 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书写、理解、使用汉字的能力则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汉字与日本文化之间的渊源进行考察, 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关于汉字传入日本的记载与传说

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 百濟王遣阿直岐。(中略)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 “如勝汝博士亦有耶?” 對曰: “有王仁者, 是秀也。” (中略)十六年春二月, 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

(摘自《日本书纪》卷第十, 应神天皇十五、十六条)

这是日本史籍《日本书纪》中的一段记载, 大意是说朝鲜的国王派阿直岐前往日本。阿直岐能读经典, 日本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从阿直岐学习经典。天皇问阿直岐: “是否还有比你更博学之人?” 阿直

岐回答道: “有, 他叫王仁, 非常博学”。次年春, 王仁赴日, 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拜其为师学习经典, 莫不通晓。在日本另一部稍早于《日本书纪》的史书《古事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所不同的是明确指出“诸典籍”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见《古事记》中卷第十一章) 这是关于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

但经查证, 上述记述并非完全属实。从时间上而言, 携《论语》前往是可能的, 但携《千字文》则值得怀疑, 因为《千字文》成于南朝梁武帝在位时期(502~549年), 而书中所记应神天皇十五、十六年是公元3世纪后期, 时间相差二百多年。尽管如此, 上述记载至少说明, 一些识文断字的异邦人迁居到日本, 给日本带来了各种技术, 而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作为一种技术也被日本所接纳。

其实, 关于汉字初传日本, 有种种传说, 在日本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除上述“王仁上贡献书说”之外, 比较有名的还有“徐福赴日初传说”和“神功皇后自新罗带回说”。传说公元前3世纪, 徐福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人及不死之药。这一传说在时间上倒是与《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相吻合。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作《日本刀歌》一诗便有述及: “徐福行时书未焚, 逸书百篇今尚存”^[2]。关于神功皇后自新罗带回一说, 《日本书纪》记有神功皇后远征新罗的故事: “遂入其國中, 封重寶府庫, 收圖籍文書”。(见《日本书纪》卷第九, 神功皇后) 但“圖籍文書”是否即是中国的经典史籍, 尚无从考证。在日本文献上, 这三种传说中, 以“王仁上贡献书

[收稿日期] 2010-03-04

[作者简介] 李 旭 (1962-) 女,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说”支持者居多。

无论经由怎样的途径传入日本,事实是,中国古代经典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字也成为日本语言文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汉字在日本的受容与变容

日本江户时代(1600~1867)的国学者本居宣长在其历经三十五年,呕心沥血完成的巨著《古事记传》中认为,《论语》、《千字文》是儒学和汉字在日本普及的启蒙书籍。事实上,不仅如此,中国的儒学思想甚至成了日本人的思想源泉。譬如武士道所崇尚的“有德文化”就是引自朱子学的“义理”“忠节”“武勇”思想。镰仓幕府(1183~1333)时期,朝廷为确保皇权永固,就向那些对幕府心怀不满的下级武士等宣讲朱子学的“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再譬如,在古代日语中,“有德”一词即是“富裕”之意,日本近代实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著作《论语与算盘》即暗合了这种“有德即富”观,作者将被称为“东方圣经”的《论语》中的儒家思想与产业相结合,提倡“义利合一”,号召从商者用《论语》的思想自省并约束自己的贪欲,因而被誉为“商业圣经”。足见中国经典在日本的融会贯通。

随着对汉字汉籍的接纳,日本人渐渐不满足于仅仅阅读汉文,开始使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传说由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就是完全用汉字记录的文本,如“以和爲貴、無忤爲宗”、“君則天之、臣則地之”、“懲惡勸善,古之良典”等。可以看出,其中大量引用了《千字文》、《论语》、《礼记》、《易经》、《尚书》、《左传》、《韩非子》等经典。作为针对官僚和贵族制定的道德规范,贯穿了中国的儒法思想,且语言朴实,文章优美,代表了当时日本文章的最高水准^[2]。可见日本人在接受汉字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传统思想和道德观念。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典籍,同样用汉字写成。《古事记》成书于公元712年,《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前者是带有神话传说性质的史书,后者属于正史。如本文开头所见,全文由汉字构成。《古事记》用的是略有日语影响的所谓变体汉文,《日本书纪》用的是标准汉文,这两部书的编纂很可能有中国、朝鲜的移民参加^[3]。所谓“变体汉文”即是指按日语语序用汉字写成的汉文,也称“汉式和文”,这也是汉字在日本的使用出现变化的开端。

然而,当时汉字被称为“男手”,限于男子使用,

汉籍汉书也只是男性的读物,只有男性才能写成的汉文等被认为是最高级别的文章,能撰写优秀的汉诗文在当时被视为男性贵族的重要能力和教养。因此,男性贵族们热衷于用汉文写诗作文,大展秀才之气。

公元751年,日本已经有了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怀风藻》收录汉诗120篇,作者均为皇族显贵。在当时的日本,模仿中国古诗创作汉诗在贵族阶层被奉为时尚。818年,奉嵯峨天皇之命编撰的《文华秀丽集》,收入汉诗148首。下面这首题为《山寺钟》的汉诗就是日本第五十二代天皇嵯峨天皇(786~842)所作,诗风明显带有六朝文学和初唐文学的痕迹:

晚到江村高枕卧,
梦中遥听半夜钟。
山寺不知何处有,
旅馆之东第一峰。

(摘自《文华秀丽集》卷下,第96首,作者 嵯峨天皇)

与此同时,和歌作为代表日本文化的独特的文学形式也渐成时尚,并形成与汉诗分庭抗礼的局面。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成书于公元8世纪后半期,书中所收4500首和歌全部用汉字写成。试看一例:

由吉能伊吕远
有婆比吕佐家流
有米能波奈
伊麻佐加利奈利
弥牟必登母我闻

(摘自《万叶集》第850首,作者 大伴旅人)

这是《万叶集》中的一首和歌,作者大伴旅人是日本奈良时期(710~784)著名歌人。这首和歌虽然全由汉字写成,但这些汉字仅仅是作为表音文字用来表记日本固有词汇,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与汉字本身的意义毫不相干。整首诗若译成汉语,大意是:

人在花中含嫣笑,梅夺雪色傲霜间。(笔者译)

上述这种完全脱离汉字的表意功能,仅仅借用汉字表音的表记方式因为在《万叶集》中的使用最具代表性,故称“万叶假名”,相对于后来的“假名”被称为“真名”。如诗中的“由吉”即是“yuki”,即“雪”的读音,“有米”即是“ume”,即“梅”的读音。在现代日语中,已经不再使用这样的万叶假名,如“雪”即写作“雪”,按日语固有读音为“yuki”,模仿汉字读音为“setsu”,前者称为“训读”,后者称为“音读”,日语中的汉字大多音训兼具。

及至平安时期(794~1192),日本已经在汉字

的基础上产生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平假名由“真名”衍化而来,即汉字草书极端化而成,片假名的原形是汉字的偏旁部首。当时,平假名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仅限于女子使用,故被称为“女手”。阅读汉籍也是男子的专利,女子只能私下偷偷阅读。平安时期出现了一批女流作家,她们均以平假名进行写作。当时最著名的两位女作家,一位是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一位是随笔文学之祖《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紫式部私下阅读《日本书纪》,清少纳言也在私下阅读当时对日本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白氏文集》,并与才气横溢的男子和诗赠答,赢得男子们的喝彩。紫式部在《紫式部日记》中即流露出对清少纳言的嫉妒之心,在《源氏物语》中也借男性之口对女性阅读汉文加以讥讽。关于汉字与假名的使用,反映了日本文化中汉字与假名各自所代表的文化特征:刚劲与柔美。

平安时代中期,假名一跃而成正式文字,逐渐开始了汉字与假名混书的表记方式,这种方式被称为“汉字假名交文”,与此同时,汉文至上的观念开始逐渐淡化。尽管如此,直至江户时代,公文和正式文书均采用汉文或变体汉文进行书写。在这个过程中,汉字的使用出现了一些变化,如简化了部分汉字的笔画,使用数量也逐渐减少,自创了一些汉字。如“峠”、“畑”就是自创新字,这种字在日本称为“国字”。这两个例子中,前者利用指事法表示登临山坡处转而下山的“山口”,后者利用会意法表示“旱田”,由此可见,日本人早已深谙汉字造字法的精髓。至此,日本文化基本完成了对汉字以及随之而来的汉文化受中求变的核心过程。

三、汉字之争与文字改革

早年的日本,知识阶层,即武士、豪农、上层商人家的小孩,从六岁起即开始诵读和习写《论语》等典籍。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所学校,15世纪的“足利学校”,教室里张挂着孔子像,学生们都在孔子像下埋头读书,学校还规定,除四书、五经、《史记》、《文选》之外,严禁学生研读其他典籍。直到江户时期,普通人眼里的学问就是识字,读汉籍,终极目标是知“圣人之道”,而“圣人之道”则在“四书五经”中,因此视汉字为神圣,对中国的经典顶礼膜拜。当时的观念是,文章中夹杂着假名是格调低的表现,全汉文写作看上去就如同中国人的作品一般,会被视为“上等”。高岛俊男将这种汉字崇拜现象直斥为“赤裸裸的文化殖民”^[4]。

明治维新前后,在日本国内,围绕汉字的使用

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争论。1866年,目睹日益强大的西方列强,近代邮政制度创始人之一,被称为日本邮政之父的前岛密向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建言,提出了《汉字御废止之议》。当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曾经被日本视为先进文化代表的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因此前岛密引用一位美国人的话,大意是说清政府之所以国力衰退,原因就在于使用复杂的汉字。而日本之所以国力不振,日本之所以知识贫乏,原因也在于此。他认为国家发展的基础在于教育,为普及国民教育,应该废止难于学习的汉字和汉文而使用假名。他的建言书是日本文字改革论的先驱。《汉字御废止之议》影响巨大,由此引发了各种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诸如“汉字不可废论”,“假名专用论”,“罗马字论”,“汉字节减论”等。后来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甚至提议放弃日语,以英语为国语。争论的结果,明治新政府规定,公文一律采用“汉字假名交文”。之所以仍然保留汉字,最重要的原因是,汉字已经与日本历史融为一体,一旦废除,必将产生文化断代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为主张废除汉字者所严重忽略。如前所述,自汉字传入日本起,日本人不仅大量引进汉文典籍加以学习和吸收,还利用汉字记录历史,创作文学。如果废除了汉字,这些文化传统将不能得到传承,等于斩断了日本的历史,日本文化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其实,在近代日本历史上关于汉字在日本的传播和使用,一直以来就有两种争议,笔者将其归纳为“受惠说”和“受累说”。前者认为,由于汉字的传入,使本没有文字的日本得以迅速将自己的文化用文字加以记录、保存,与此同时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字体系,因此应该感谢汉字。后者则认为,正因为汉字的传入阻碍了本国文字的正常发展,导致和语只有表示具体概念的词,而没有表示抽象概念的词。如和语里有“风、雨、雷、电”,却没有“气候”,有“春、夏、秋、冬”,却没有“季节”,而“理、义、贤、德”等更是产生于中国人生活中的抽象概念。如果日语不受汉语侵蚀,任其自然发展,也会产生出与之相应但又有所不同的词汇,但是汉字阻断了这种可能性^[4]。两种观点截然对立。

明治维新后,日本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大量使用汉字,一是有人倡议取消汉字,全部采用表音文字,如假名和罗马字。出现前一种倾向是因为日本结束长期的锁国政策,实行门户开放,大量吸收西方先进思想和生活方式,因而随之产生了大量汉语新词汇,而此时的汉语词汇是日本人利用汉字自创的词汇,被称为“和制汉语”,这些和制汉语后来

也大量反输中国,譬如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科学、法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词汇很多都是和制汉语,如“文化”、“文明”、“思想”、“法律”、“经济”、“资本”、“阶级”、“宗教”、“哲学”、“科学”等。对此,主张“受累说”一方认为,这类抽象而深奥的词汇的大量出现,导致日本人在语言问题上出现了困难和混乱,因此主张取消汉字,采用表音文字,而“受惠说”一方则认为正因为汉字强大的造字能力,才得以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新概念。

本居宣长就是对崇尚汉字汉文现象的最强烈的批评者。他认为中华思想不仅渗透于读汉籍之人,甚至渗透于连汉籍都未曾谋面之人,这种状态必须改变。于是宣长身体力行,开始尽量用和语写作,以践行自己的主张,但结果是他的文章反而显得“瘫软无力,词不达意”^[4]。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是因为和语本身缺乏抽象概念的词汇,二是汉语式表达结构是以名词为中心,容易使事物客体化,因而较为理性、逻辑性强、具有概括性,适用于归纳思想,发表议论等^[5]。再就是当初男人们一味崇尚汉字汉文,只允许女人们使用假名,所以导致女人们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描述自己的情绪,难以用假名写出铿锵有力、逻辑性强的文章。也是因为这些原因,至今为止,在公文、论文及专著等正式文中,汉语词汇的比重甚大。

四、汉字与现代日语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后,“汉字废止论”重新抬头。被日本文坛尊为“小说之神”的作家志贺直哉认为,日语妨碍了文化的进步,必须改革,他甚至断言,如果当初改用英语做国语,或许日本文化比现在进步得多,甚至这场战争也可能被避免^[6]。1946年,盟军总司令部派往日本的“教育使节团”也向日本政府建议“从根本上改革日本的文字”。是年,日本政府采纳了“汉字节减论”,公布了“当前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的汉字”,即“当用汉字”1850个。与此同时,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发布命令称:“我国所使用的汉字数量多,用法复杂,给教育和社会生活造成诸多不便,限制汉字的使用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生活效率和文化水平”。1948年,成立了国立国语研究所,专门从事国语改革问题的研究。1981年,日本内阁在“当用汉字”的基础上颁布了常用汉字1945个。时隔28年后的2009年3月,日本文化厅公布了前言中提到的旨在“适应信息化时代需要”,将常用汉字增至2131个的“新常用汉字

表”试行方案,并将于2010年正式定案实施。

与此同时,在外来语大量入侵,电脑广泛普及的今天,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中存在着嫌汉字笔画多,太复杂,因而不爱写汉字的倾向。有鉴于此,许多学者纷纷著文著书对汉字的种种优势进行分析,引导人们认识汉字在日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代日语之美,热爱自己的语言,不要一味崇尚英语。

金田一春彦就在《日本语》一书中,以“车”为例,对汉字强大的造词功能加以说明,如新车即“新車”,旧车即“中古車”,进口车即“外車”,车位已满即“満車”,车距即“車間距離”等,因为有了汉字,就可以如此这般组合成表达新概念的词汇^[7]。

铃木孝夫在《封闭的语言·日语的世界》一书中以“人类学”为例,对汉字强大的表意性、灵动性与意义多元性加以阐释。他认为,连中学生都知道“人类”是指“人的种类”或“人的全部”,由此即可类推“人类学”就是指“关于人的学问”。而如果是英语,不知道“anthropology”这个词的人就无从推知其义了^[8]。

铃木孝夫还将汉字形象地比喻为“两面神”。正如两面神的前后两张脸不能与一个头切割开来一样,日本人使用的汉字是从视觉的角度表达基本概念,这种汉字符号就好比是两面神的头,其音读和训读就好比是前后两张脸。他还把这种“两面神”的性质进一步比喻为“音读就好比来访日本语言意识之港的外国轮船,汉字这把锁链将有可能离港而去的外轮牢牢固定于训读这一固有基础词汇的锚上”^[9]。意即汉字与日本人的语言意识已经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了。

高岛俊男则认为,汉字是日语中“令人棘手的重荷”,是一个与身体长在一起的“重荷”,虽然与日语本身的体质不合,无法相生。但是,如果摘除这个“重荷”,日语只会变得越来越幼稚,甚至死去^[4]。

加贺野井秀一指出,正因为汉字假名混合书写的缘故,使和语的柔美与汉语的刚劲相得益彰,张弛有度^[5]。

除专家学者之外,日本一些社团和媒体也针对汉字缺位现象,采取各种措施扩大汉字的影响力,譬如“汉字能力检定”,“今年的汉字”,“四字成语自创大赛”等,在藉此反映种种世相的同时,促使广大国民重新审视汉字,重温汉字的魅力,以防止汉字在语言中的退化。

五、结语

汉字与日本文化的关系,就好比是时间链上的

链环,互为依存,缺一不可。汉字已经成了日本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以日本人习惯使用的纪年方式年号为例,日本历代年号均取自中国典籍,现行的年号“平成”取自《书经·大禹谟》之“地平天成”和《史记·五帝本纪》之“内平外成”;“昭和”取自《书经·尧典篇》之“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大正”取自《易经》之“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明治”取自《易经·说卦篇》之“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10]。如果这些年号都用表音文字进行标记,那么年号本身所蕴含的深刻内涵便无从追溯了。

再如20世纪末的1999年9月,茨城县东海村铀燃料制造厂发生了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临界事故”,现场工作人员和附近居民遭到辐射。辐射在日语里叫做“被曝”但“曝”不是常用汉字,报纸报道时都以“被ばく”代之,而“爆”在日语里与“曝”同音(ばく·baku),导致读者误以为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海外媒体也迅速予以报道^[6]。这就是由于过分拘泥于常用汉字,简单地使用表音文字,因而发生同音冲突引起的误会。日语中存在大量同音异义词,如果用汉字书写出来,由于汉字所具有的视觉“透明性”而一目了然。本次日本文化厅决定增加常用汉字的数量,其原因应该也在于此。

综上所述,汉字传入日本约一千六百年,以汉字和汉字假名交文的形式保存了日本的历史和文

化,与日本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即是说,汉字已经和日本的历史、文化血肉交融,不可分割。

参考文献

- [1] 「常用漢字表」で意見募集.读卖新闻官网.[EB/OL]. [2009-3-17]. <http://www.yomiuri.co.jp/kyoiku/news/20090317-OYT8T00327.htm>
- [2]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5-48.
- [3] 宋再新.和汉朗咏集文化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6: 20.
- [4] 高島俊男.漢字と日本人[M]. 东京:文艺春秋, 2002: 122-245.
- [5] 加賀野井秀一.日本語の復権[M]. 东京:讲谈社现代新书, 1999: 178.
- [6] 池上彰.日本語の「大疑問」[M]. 东京:讲谈社, 2000: 87.
- [7] 金田一春彦.日本語[M]. 东京:岩波新书, 1988.
- [8] 鈴木孝夫.閉ざされた日本語・日本語の世界[M]. 东京:新潮选书, 1975.
- [9] 鈴木孝夫.日本語と外国語[M]. 东京:岩波新书, 2003: 145.
- [10] 刘元满.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25.

A Brief Research of Historical and Present Relation between Kanji and Japanese Culture

LI X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been imported to Japan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and have gone through numerous reformations and deformations. Known as Kanji, Chinese characters are blended with Japa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Kanji have even become the symbolic sign of Japanese culture. To research the charm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Kanji, this paper proposes detailed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history and legends of the importation as well as acceptance and deformations of Kanji in Japan.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Kanji and Japanese culture is interpreted in several aspects.

Key words Kanji; Japanese culture; acceptance; deformation; blending

编辑 刘 波